

作为“宣传范式”典范的“新华体”： 历史变迁与内涵建构

刘 勇

【摘 要】 新闻文体宣传范式实质是运用新闻进行宣传,其强调新闻承载的是意识形态功能,体现的是政治力量对于新闻的征用。“新华体”源自新华通讯社的文体实践与推广,历经多个历史时期,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宣传范式”基座上的典范性文体形态。其中,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宣传需求和现实条件,规约了“新华体”的文体类型和报道风格,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力行”奠定了“新华体”的文体理念与文体技巧,新华社“国家通讯社”地位的确立、“通稿制度”的形成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宣传社会主义成就的需要,推动了“新华体”全国性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历史变迁与传媒格局变化,“新华体”的内涵得以不断调适,“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成为新时代“新华体”的变革方向。

【关键词】 新闻文体;宣传范式;文体范型;新华体

作为不同性质新闻文体规范的提炼与表征,“新闻文体范式”规定了新闻文本的基本框架、结构方式以及话语体式等,含蕴了不同文体形态与文体理念。经由记者与媒体文体实践的积淀,不同“新闻文体范式”则常常会“固化”为一种或多种“文体范型”,这些“文体范型”的“定型”,实质也是其遵从新闻文体规范,建构“新闻文体范式”,参与新闻文体嬗变的过程。我们在《新中国新闻文体 70 年:“范式”的共生与交融》一文曾将新中国的新闻文体归纳为“宣传范式”“文学范式”和“专业范式”,“宣传范式”则是 1949 年以来中国新闻文体的主导范式,其实质是运用新闻进行宣传,强调新闻承载的是意识形态功能,体现的是政治力量对于新闻的征用。^①基于此,本文聚焦“宣传范式”的典范文体形态——“新华体”的历时性发展,考察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锚定过程,继而反观“新闻文体宣传范式”的形构以及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观念的变迁。

一、“新华体”：“宣传范式”基座上的典范性文体形态

“新华体”最初得名于新华通讯社的实践。“所谓‘新华体’,是一种处于不断改革、嬗变过程中的‘动态文体’,它是与新华社‘消息总汇’这一特殊新闻媒介的性质密不可分的。”^②长期以来,伴随

刘勇,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本文系中宣部 2019 年度“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项目”的研究成果。

①刘勇:《新中国新闻文体 70 年:“范式”的共生与交融》,《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②王君超:《第三只眼睛看传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47 页。

新华社的文体实践与推广,“新华体”逐渐被“定格”为“宣传范式”基座上的典范性文体形态,“无论纵观还是横看,基本上可以说,一部新中国的新闻文体发展史——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便是‘新华体’担纲的历史”。^①

然而,学术界对于“新华体”不仅缺乏统一的界定,而且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对此,我们从不同时期出版的四部辞书对“新华体”的收录情况即可见一斑:1990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新闻学科部分由萨空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1993年版的《新闻学大辞典》(甘惜分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都没有收录“新华体”词条,1992年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刘建明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和2014年版的《新闻传播学大辞典》(童兵、陈绚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均收入了该词条。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将“新华体”的特征描述为:“消息简洁,文字精炼、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②

《新闻传播学大辞典》则对新华体做了如下界定:“段落安排仅为导语、主体与结尾三段式的消息结构形式。因为新华社首先并习惯采用,故名。具有段落分明、一目了然等长处,但也有俗套、缺乏活力的短处。已有所改进。”^③

两相比较,前者从风格、结构、题材、主题等维度,着力凸显了“新华体”的文体优点。后者则将“新华体”限定在“消息”框架内,聚焦其结构优势,亦没有回避其“俗套、缺乏活力”的缺点。

应该看到,作为“宣传范式”的典范性文体,“新华体”彰显了新闻与宣传的交叉,其结构方式偏向新闻文体,话语体式又承载宣传功能,实质是一种“用新闻进行宣传”的文体形态。因此,在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发展进程中,伴随“宣传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新华社“国家通讯社”的传播优势,“新华体”的影响逐步拓展至全国,“一体独大”的优势与弊端也势必逐步显现。对此,武汉大学樊凡教授的剖析最为恰切:“‘新华体’是人们对一度流行的新闻文体风格的亦庄亦谐的概括。新华体,本来并无贬义,它有简洁、准确、朴实、完整等特点,曾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好稿。但它也有不足,比如消息就是消息,通讯就是通讯,特写就是特写。由于人人竞相仿效,几十年来形成了单一呆板的风格。新华体的语言是‘人民调’,即一种文件化、公报化的概括式叙事腔调。其结构往往是所谓的‘排浪式’,即将一些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现象,罗列成篇,用序数的方法起笔,用序数的方法展开,最后用序数的方法结束全文。如讲新面貌,就是五多、十多。讲关心群众办好事,就是十件好事、八大实事,讲工作就是九大任务、十大措施等。”^④

二、革命战争年代:“新华体”基本类型与风格的奠定

新华社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诞生的“红中社”。1937年1月,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可以说,革命与战争建构了“新华体”的现实环境与基本时空。

①孔祥军:《新闻传播精品导读:新闻(消息)卷——范式与典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②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247页。

③童兵、陈绚:《新闻传播学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305页。

④樊凡:《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

（一）从“公告式新闻”到“综合消息”：“新华体”初期的类型化

“新华体”最显著的风格是政治性、政策性强,行文简洁、一目了然,文风朴实。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新华社的本质定位以及革命战争年代的条件限制有关。新华社从诞生伊始,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关存在,担负着发布战报、文件、党的指令、会议精神、政治宣传等基本任务,从而奠定了“新华体”最初的“公告式新闻”风格。无论是在抗日革命根据地时代,还是在解放区时代,新华社都面临着政治宣传的功能定位、电讯等技术条件的限制、宣传人才的匮乏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对“新华体”最初的风格形成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此,《新华通讯社史》中就有过明确记载:“新华社的广播稿是供各解放区报纸刊登的,因而政治选择是最重要的。另外因为发稿线路容量有限,要求广播稿在文字上一定要尽量简洁,不能有废字赘句。……经过努力,新华社播发的稿件逐渐形成了严谨规范、通俗流畅、简洁明快的文风和特色。”^①由此,新华社政治宣传的核心定位决定了“新华体”框架下“公告式新闻”的首要特征即是政治性,因此其表述必须“严谨规范”。而广播的大众传播属性和新华社发稿线路的容量限制,则造就了“公告式新闻”通俗流畅、简洁明快的特色。

如果说,新华社建立之初规约了新华体的基本文风。那么,1942年“延安整风”开启的第一次新闻改革则奠定了“新华体”在报纸消息文体上的基本传统,亦即大量运用综合消息指导具体工作。这是因为,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不仅是“党的宣传者”,也是“党的组织者”,担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这种任务通过党报“指导性”原则来加以落实——“要指导,不能光用事实,必须有思想观点。思想观点要令人信服,用一个事实往往缺乏说服力”。这样,就需要对各地群众的生活生产实际情况、各部门各区域的工作经验与共性的问题,加以概括,运用综合消息的形式进行传播,从而增强报道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

与此同时,还应该考量解放区的读者现状和宣传效果问题,“对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来说,综合消息也方便了他们的阅读。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概括能力差,一事一报的消息即使加上一段新闻导语,他们读起来也会摸不着头脑。另外,当时解放区报纸的基层读者多为干部和教员,他们承担着向群众做宣传的任务。综合性消息比起一事一报的消息,当然便于作口头宣传了”^②。基于此,由于新华社还承担着向各解放区党报、党台供稿的任务,为了配合党报的改革和实际工作需要,“新华体”也从“一事一报”的“战报式消息”拓展至“综合消息”。

其时的综合消息,大多为“非事件新闻”,内容包括工作经验、先进事迹、生产情况等,其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多元素新闻”,往往由许多事件(或事实)构成,强调“概括地报道一个地区、一条战线、一个方面的情况”;一种是“单元素新闻”,亦即“集中报道一个事件的全过程及与这个事件相关的事情”。综合性消息大多采用“一个观点+若干例子”式的写法,其结构包括四个部分:导语——包含五W,消息中最新最重要的事实;背景——事件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或对导语中的名字作些说明;主体——详叙经过;结尾——展望未来或加评论。消息的主体部分往往把事实归类,在一个观点下套几个例子。^③ 譬如下面这篇报道:

完全粉碎敌进攻计划 我主动撤出延安空城

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指挥全国爱国自卫战争^④

新华社陕甘宁二十日电 侵入关中分区之蒋军,已陷入人民游击战之天罗地网中。二月二十一日,蒋军侵入关中首府马栏市后,当地军民立即展开游击战争,广泛袭击敌人。上月二十五日,耀县

^①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

^②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9-100页。

^③参见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第98页。

^④报道选自孙德宏:《中国百年新闻经典〈消息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7-58页。

蒋特三十余人至柳林区梁寨坊一带编保甲时,被游击队打死十余人,俘四名。由马栏向耀县出扰蒋军,亦在该地区被俘十一名。赤水游击队于本月五日深入敌后,攻入枸邑土桥镇,将该地碉堡工事全部平毁,七日晚一举收复梁庄,俘蒋记“自卫队”中队长以下三十五人,缴轻机枪三挺,步枪十七支,赤水广大地区已告收复。现各地军民正积极开展反“清剿”与反抢掠斗争。

(《人民日报》1947年3月22日)

这篇报道即是一篇典型的“新华体”综合消息。消息第一句话即交代核心观点:“蒋军已陷入人民游击战之天罗地网”。紧接着,报道选择了四个不同时间、地点的实例来“论证”核心观点,结尾既是对之前战果的总结,又回到“当下”,转向“各地军民正在开展的两个斗争”,由点及面,收束全文。

面对日趋丰富的文体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新问题,新华社还及时以“公开信”的形式加以总结,构成了“新华体”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1946年1月1日,延安新华总社给各地总分社和分社发出一封指示信——《把我们的新闻事业更提高一步》,对新闻写作提出了九条具体要求:“1. 要扩大报道范围,深入实际,反映各阶层人民与各种人物的生活和动态,发掘新事物和新创造。2. 报道要有系统和连续,前后衔接,有始有终,尤其是重大事件和运动的报道。3. 要确实、迅速。这影响政治信用和宣传效果甚大。不真实的新闻,给读者印象之坏,是不言而喻的。新闻时间之差,影响政治上的主动与被动。要力争时日,培养时间观念。4. 要有说明、注释、比较、对照等。5. 新闻写作要实事求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最忌随便乱说议论。6. 写作必须贯注思想和感情,把它融汇在新闻的叙述和描写中,以引起读者的共鸣。7. 要讲究布局和剪裁,取舍材料。8. 最重要的内容,应放在最前面。重要新闻要有导语。导语是择取最中心最精彩之点,不要与本文重复,避免抽象公式。9. 写作要有起伏和变化,避免枯燥和平铺直叙。”同年5月23日,新华总社又发出了题为《电讯要简练》的公开信,进一步提出要解决“新闻电讯冗长和迟缓”的问题。该公开信指出,电讯“是传达社会动态的紧急工具,在新闻中是最精干的形式,它以最简洁的文字和最高度的速率来报道最重要的新闻”。因而,电讯写作“必须紧缩字句,做到简练,迅速报道”。^① 这两封信是在解放区新闻宣传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改进策略,其内容涉及报道观念、宣传效果、报道题材、报道方式、文体结构、语言表达、新闻风格等诸多方面,是新华社统合文体观念——文体技巧、动态消息——综合消息两个维度,对“新华体”进行的一次规范化阐释,从而锚定了“新华体”的基本理念与技法。

(二) 毛泽东的“身体力行”型构了“新华体”的本质内涵

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与文章,形塑了“新华体”本质内涵。

一方面,他要求新闻宣传必须“真实”,强调“用事实说话”。早在1925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就明确指出:“《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宣传的辩论。”^②1945年,他又在《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讲话”中指出:“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③这些都从本质上彰显了以“新华体”为代表的“宣传范式”的本质属性和规范性理念。

另一方面,他还对新闻写作方法提出具体的建议与思考。1931年,他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中辩证地论述了“在消息中如何穿插评论”的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

^①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第275-27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6页。

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①。这段话遂为后来“新华体”写作中穿插“评论”提供了依据。

1948年9月,他在一条指示中明确提出标题的写法。“凡新闻,标题必须有内容。原题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建国后“新华体”的消息标题大多使用实题,既言之有物,又突出亮点,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不无关联。同年11月,他又要求多写“综合新闻”,“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并要各地分社负责人(普通记者不能写此类通讯)或党的负责人学会写这类综合性的报道。而我们是长久缺少此类报道的”^②。毛泽东将综合消息置于全局性维度加以考察,这也是后来“新华体”长期聚焦“综合消息”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华社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型构了“新华体”的文体特征和基本写法,成为新闻工作者竞相模仿和学习的典范。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与《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1949)两篇报道。前者奠定了“新华体”综合消息的基本写法,后者型构了“新华体”动态消息的核心技法。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中,8个字的消息标题,即突出了核心新闻事实。概述式导语开门见山,明确交代新闻事件的五要素,呼应标题,凸显新闻主题。主体部分第1段仅用92个字即交代了南阳的历史背景,不仅增强了报道可读性,也展示了南阳自古以来的战略地位,从而衬托新闻事实的价值。第2段以新闻背景作为过渡句,承上启下,既凸显国民党对南阳的重视,再次凸显我军占领南阳的意义,又开启了下文对于国民党南下总体溃败的叙述。第3段再次通过新闻背景,突出南阳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反衬我军占领南阳的意义。第4段用事实说话,叙述蒋军在南部战线的整体性溃败,凸显我军的胜利战果。第5段通过交代新闻背景,综合列举多段事实,展示我军一年多来的诸多战绩,凸显新闻事实的大意义。第6段以白崇禧的话作为直接引语,引出作者的“观点”——“他是怕对了”。这是基于事实的评论,“生了根”“枝叶茂盛”的比喻则更显生动、自然。第7段笔触转向新解放地区。首先交代新闻背景,客观叙述新解放地区的土改犯有错误,但迅速纠正,并借此宣传了解放区执行的正确政策以及对这一政策的客观评价。第8段再次将视角聚焦到国民党军队,“固守孤立据点”“弃城逃窜”则突出了敌人的溃败,也引出下文对于国民党军队后续动向的叙述。第9段依然通过冷静地叙述事实,展示国民党的败绩,交代新闻事件的结果,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部队动向与人员调遣的了解程度。最后一段则运用基于事实的“评论”,既有理有据,又独具深意,彰显“新华体”“用事实说话”的宣传意蕴。

通观整篇报道,虽然没有细分段落,但全文逻辑清晰,脉络清楚,一气呵成,气势如虹。写法上强调“用事实说话”,以单一新闻事实为由头,聚焦多元新闻背景,凸显宣传主题,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事实与观点交相呼应,新闻背景与历史掌故相映成趣,聚焦逻辑的跳跃行文,为“新华体”的综合消息奠定了基本写法,成为新闻记者学习的“范文”。胡乔木后来多次提及该篇报道的价值。1953年,他在《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一文中指出:“毛主席所写的新闻可作为我们的模范。如毛主席曾写了一条解放南阳的消息,都用事实说话,没有议论,又有背景说明,写得很有风趣。”^③1984年,他在《新闻要跟上新的信息技术》一文中再次指出:“毛主席当年写的占领南阳的新闻就没有几个人能写出来,我也写不出来,因为我的历史知识、地理知识都不如毛主席。我们希望把新闻写得丰富多彩,叫人看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5-196页。

③《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

起来有广泛的兴趣,有较强的吸引力,没有多方面的知识作基础就不容易写好。”^①

与之相对照,《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全文只有短短 198 个字,表达方式以叙述为主,结合白描、议论与抒情等多种手法,动态展示出新闻事件的进程。消息标题同样选用“实题”,突出核心新闻事实;导语开门见山,主体第 1 段交代时间、地点两个新闻要素;第 2 段运用对比式写法,凸显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溃败;第 3 段运用举重若轻的白描笔法,显示出大军南渡的壮阔场景,“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凝练地描绘出解放军南渡长江、势如破竹的恢弘场景;之后,连续通过“突破”“占领”“进击”三个动词,用事实说话,动态化展示解放军所向披靡的英勇气概;结尾运用议论加抒情的笔法,深化了新闻主题。整体观之,这篇报道生动地展示了“新华体”动态消息的基本特质:主题重大,一事一报,辞简意丰,大气磅礴。

三、建国初期至“文革”前:“新华体”全国性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逐渐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新华体”也随之展现出勃勃生机,并长期成为全国媒体竞相模仿和学习的“典范”——“所谓的‘新华体’实际上是我国新闻界在长期新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新闻写作体式,一种优良的新闻文风。与其称之为‘新华体’,倒不如称为我国新闻文体或文风更符合实际”^②。

(一) 这首先得益于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地位的确立

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开宗明义:“使新华社成为统一的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条件,现已成熟。”^③同年 4 月,新成立的新闻总署第八次署务会通过决定,“新华社必须从组织上、工作上完全统一起来,彻底改变分散的情况,加强对全国和全世界的报道工作,俾能充分发挥其为国家通讯社的作用,真正成为代表国家发布新闻的机关”。同时规定,各总分社的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凡当地有二家以上报纸者,负责向各报抄发新华社电讯稿和通讯稿”^④。此后,新华社的全国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也为“新华体”的全国性地位奠定了基础。

(二) 这有赖于逐步形成的“通稿制度”

1949 年 2 月,全国解放的步伐越来越近,各地使用新华社的稿件却屡屡出现问题。为此,新华社总社下发《新华总社通报各地选择总社稿件时应注意之点》,对各地使用新华社稿件做了初步的规定:“总社中文文字广播稿件分作甲乙两类,以区别他的重要和次要。这是根据稿件的内容质量和全国一般的需要测定。……因此在选择稿件时应该主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而不必为总社所分的等级所束缚。总社所标记的甲乙类别,只可作为一种选择稿件时的参考。……也有些一般性的新闻文稿,因为受某种实际情况或条件限制,不能全文刊载,还可加以节删或改写。但经节删或改写发表的稿件,就不要用新华社名义,而可以用本报讯字样或在本报讯的报头之下,写明是根据新华社消息,以标明这稿件是经报社自己改写的。”^⑤

这一规定对各地使用新华社稿件进行了初步规范,亦即各地在使用新华社通稿时,可以按照实

①《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第 351 页。

②文有仁:《漫议“新华体”》,《新闻爱好者》2001 年第 5 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年,第 1 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 1 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年,第 365 页。

际需要,不受总社对于稿件等级分类的限制。同时,也可以节删或改写新华社稿件,但要标明“据新华社消息”。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再次下发文件,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报纸采用新华社稿件的基本办法:1.各报对新华通讯社电讯得按照情况斟酌取舍,但采用时一律不得增改。2.各报(特别是通俗报和小型报)因篇幅限制和读者需要不同,对新华社电讯中之普通新闻稿,可以节删,或改写为更通俗的文字,但节删后,不应再用新华社电讯名义,而应改用“本报讯”,并加“据新华社日电”字样。如因节删或改写而发生错误,应由节删或改写之报刊自行负责,并须更正。3.一般大报对新华社所发表的各种特别重要性的稿件,如政府公告、外交文书、社论和重大的政治外交新闻等,不得节删。通俗报和小型报对于最重要的公告亦不得节删,但可附加通俗解释。对其他文件,在必须改写时,可以改写,但改写后即不得用原有文告,或新华社电讯名义。^①

与前一个相比,这个规定首先加入了一个明确的禁令,对于通稿,“不得增改”。同时,“节删和改写”如果发生错误,“文责自负”。此外,明确了不能节删的对象是“特别重要的稿件”。这些延续至今的规定,客观上为“新华体”长期“一体独大”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三)“新华体”的繁荣还与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需要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间,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巨大成就,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时“新华体”的基本写法往往习惯采用“具体的对比”手法,藉此显示新旧社会的差异,凸显新社会的优越性。行文上,导语多采用“概述式”或“直叙式”,结构则大多采用漏斗式结构,亦即“倒金字塔+正金字塔”的结构,《长江大桥车水马龙》《“梁山伯”结婚了》《上海严寒》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范之作。例如,新华社1956年刊发的《跨进了社会主义门槛》,就生动地展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新华体”动态消息的基本写法:记者本身带着真挚的情感,主题以小见大,写作上强调情景交融,夹叙夹议,尤其擅长运用事实进行“具体的对比”,从而印证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具体来说,本篇消息标题一语双关,言简意赅,揭示新闻价值。导语第一句话直陈其事,“上海公私合营获得批准”,既交代“新闻眼”,又提供了新闻要素。之后,记者用充满画面感的白描手法,通过外在场景,衬托上海市民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主体第1段第一句承接导语,揭示主题。第二句话则进一步陈述事实,继而开启下文。从主体第2段开始,消息按照“时序式”结构推进,叙述与描写相结合,动态展示新闻事件进程。第3段以记者的观察为切入点,描述了报喜队的基本情况,同时,辅之以相关细节,继续描画喜庆中的上海。第4、5段分别使用了两处“具体的对比”:第一处选择“一家工厂重新打开一扇封闭了多年的大门”这一细节,生动地说明了解放后的生意比解放前要好得多,从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二处则选择两家挂了公私合营新招牌的糖果厂为例,叙述了他们在旧社会是恶性竞争的冤家,新社会却变成了携手互助的友商,从而再度展现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新风尚。结尾以彩灯、霓虹灯在上海上空形成的“喜庆的红光”作为“意象”,以评论性话语做结,预示上海在新社会中获得“新生”。

当然,这种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于“综合消息”之中。譬如《上海工业每分钟创造的价值》(1957年)这篇典型的“成就报道”。记者没有平铺直叙,而是选择了一个巧妙的角度,将繁琐的工业统计数据进行了重新演算,分别纳入1952年和1957年的“一分钟”“四分钟”“一小时”“一天”“四天”“五年”之中进行对比。“在同样的一分钟时间里,1952年上海只能炼出130多公斤钢,现在已经达到950多公斤;1952年只能织出一公尺多精纺毛织品,现在已经达到13公尺;1952年只能做出53双胶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31页。

鞋,现在已经达到126双。”整篇报道按照总——分结构展开,主体每一段都运用“具体的对比”,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新成就。这也体现出其时“新华体”综合报道的基本特征,诚如吴冷西对“综合报道”的界定:“要充分注意概括与具体相结合。新闻的概括是必要的,为的是使读者了解概貌,知道某一事件在全局中占什么地位,不为繁琐的现象所蒙蔽;同时,具体实例与形象也不可缺,目的在说明问题,加深读者印象。……要充分注意思想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做到中心突出,条理分明,层次有序。要充分注意文字的简洁谨严与生动活泼相结合。要充分注意辞藻丰富和文法完整。”^①

四、改革开放以来:“新华体”的变革与调适

“文革”十年,作为“宣传范式”标志的“新华体”也遭到重创,逐渐出现“口号化”“公式化”“脸谱化”倾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第三次新闻改革随之开启,新闻界首先从新闻写作入手切入改革,而此时被诟病为“事实与观点不分”“新闻与评论不分”的“新华体”,自然首当其冲。1979年,穆青在一次谈话中批判道:“所谓新闻报道,跟党政工作经验交流文章的内容差不多,往往是观点加例子,事实和评论不分。这也难怪人们不关心时事,实在是新闻机构的生产能力太低下、新闻意识太缺乏了。”^②1980年,甚至有研究者将“新华体”的问题称作“新八股”——“开‘中药铺’,是我们新闻写作上的一个毛病。许多消息的叙述方法,都是一、二、三、四地列出一张账单,成为一种新八股”。^③

1982年,穆青再次提出“新闻写作可以增加散文形式”的主张。同年,新华社记者郭玲春撰写的消息《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率先打破了“新华体”的僵化模式,“散文式新闻”遂成为整个新闻改革的突破口。1983年,穆青提出“学会写视觉化新闻”的主张,号召记者“要运用形象思维,把生活中那些最精彩、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最本质的形象摄取出来,表现出来”^④。无论是“散文式新闻”,还是“视觉化新闻”,其出发点都不是要全盘否定“新华体”,目的只是为了让新闻更生动、更形象、更具可读性,其实质是“宣传范式”对于“文学范式”的借鉴与融汇。由此,学术界对“新华体”的认识也从全盘否定转向辩证与理性,“‘新华体’也不是死板的代名词,它也有简洁、准确、完整的优点。”^⑤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闻改革向纵深发展,“新华体”又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时代的问题——“官方媒体的通病是没有引语,没有人物的面孔,没有消息来源以及没有内容。官方新闻媒体还有很多固定模式、陈词滥调、形容词、渲染性的语言、过多的政治术语和过多的述评性语言。……官方媒体还有过多的会议和成就报道,而绝大多数这样的报道都是无效新闻。结果媒体失去了传播的功能,因为没有人愿意读这样的新闻”。^⑥

1997年7月1日,新华社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别了,不列颠尼亚》,开启了“新华体”的创新之旅。本篇报道主题重大,基调庄重,概述式导语总括全文,“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的时刻”则为整篇报道定调。第二段是一个“支持性段落”,既承接导语,又开启下文。主体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通过记者的现场目击,着力描述了四个场景:港督府告别仪式、添马舰东广场告别仪式、中英香港交接仪式、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离开香港。其中,巧妙穿插了多段新闻背景,诸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127-128页。

②转引自李春:《当代中国传媒史》(上),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③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作品评析》,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④穆青:《穆青论新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40-245页。

⑤《中国新闻年鉴198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⑥林晖:《历史的探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203页。

如“面色凝重”“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巨幅紫荆花图案”等细节的刻画丝丝入扣,尤其是结尾部分“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一语双关,画龙点睛,达到了首尾呼应的效果。

2000年左右,伴随新闻专业主义的引入,新闻文体“专业范式”逐渐型构,“新华体”开始借鉴“专业范式”,征用客观报道手法,用专业的方式进行“宣传”。2007年,人民日报刊发的动态消息《全国人大高票通过物权法》就没有止于信息告知,而是试图解释物权法颁布的意义。全文一共12段971个字:导语1段,直接引语3段,新闻背景4段,物权法相关内容介绍3段,会场内容1段。

概述式导语既直接阐明新闻主体事实,又诠释了“全国人大高票通过物权法”的法理价值。主体部分中,第1段开门见山,引用物权法的第一编第一章的规定,呼应导语设定的新闻主题。第2段,运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的直接引语对该规定进行专业解释和意义确认。第3段通过对两处新闻背景的引入,交代物权法起草之前的政治依据和法律准备。第4段从新闻背景中找到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亦即本篇报道的主题。同时,使用间接引语,客观呈现历史上的诸多争议,为引入下文专家的意义解读做出铺垫。第5段通过摘引第二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的直接引语,回应争议,也阐释“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的法理意义。第6段没有使用任何过渡性表述,运用断裂行文法,直接“跳”到全国人大的会场。用精确的时间、具体的数据,呼应导语中“高票通过物权法”这一事实。第7段通过第三位专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的直接引语,对物权法获得通过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深度解析。第9段再次接入一段新闻背景,对第8段中专家话语进行必要补充,并交代了起草物权法的时间原点。第10段则提供了按时间顺序排布的新闻背景,意在展现物权法起草的具体过程。最后两段的行文再度发生跳跃,从新闻背景直接转到对物权法具体内容、条款数目以及施行时间等信息的客观陈述上,拓展了报道的信息量。

整篇报道运用叙述的表达方式,概述式导语交代物权法通过后,即直陈该法的法理价值。报道结构逐层深入,“断裂行文法”的使用强化了报道内在的逻辑,记者巧妙地将新闻事实、新闻背景、专家言说与会场情境紧密勾连,在现场、背景与解读中不断辗转腾挪,既客观地再现了事实,又深入地解读出物权法颁发的社会意义与法理价值。此处,“新华体”在宣传范式和专业范式之间达至平衡,在遵从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运用信息的组合,在有限的篇幅中最大限度地挖掘了报道的深度。

2010年以来,伴随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介的崛起,视频化、社交化、碎片化等逐渐成为新媒介的新闻呈现方式和话语体式,传统新闻的叙事逻辑和文体结构均面临转型与变革。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由此,“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遂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新华体”改革的方向。目前,我们可以观测到动向有二:其一是重大主题故事化呈现,其二是消息体裁特稿化。譬如,2020年5月29日新华社新媒体发布的图文报道《一个破损的“生日”蛋糕》。这篇报道运用特稿式的标题,构建了一条简单的故事线: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一群老师打算为偏远地区的藏族学生过一个集体生日→校长驱车8个小时,到县城买来生日蛋糕→一路颠簸,蛋糕破损→老师们经过40分钟的努力,修复好蛋糕,孩子们过了一个开心的生日→结尾用藏族校长的话点明主题——“虽然地处祖国最偏远的地方,但我们要让孩子们获得的爱,一点儿不会少!”。

表面看,这篇报道讲述的是教师热爱学生这样一个有温度的“故事”,但其背后却含蕴着一个带有思想性的重大主题,亦即国家“兴边富民”政策给偏远地区带来的巨大改变:人口增多,教育条件大大改善,“以前孩子上学要去30公里外的扎日乡小学,骑摩托车走盘山道得3个多小时,还时常面临山顶落石的危险,7岁的孩子只得住校,碰到冬季大雪封路,过周末待在学校里孤单得直哭”。与之

对比,“来到新学校后,上下学只需步行 5 分钟,学校还免费提供一日三餐”。报道选择了特稿的呈现方式,合理设置情节,突出人物的语言形象,灵活穿插新闻背景与直接引语,强化细节与场景的描摹,这些都超越传统“新华体”的范畴,显示出“有品质”新闻报道的基本素质。

(责任编辑:蒋永华)

“Xinhua Style” as a Model of “Publicity Paradigm” : Its Historical Changes and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LIU Yong

Abstract: The so-called “publicity paradigm” of news style is to publicize the information by news reports, emphasizing that news carries ideological function and embodies the requisition of news by political forces. The “Xinhua style” of Chinese journalism originated from the stylistic practice and promotion of Xinhua News Agency. After multiple historical period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typical stylistic form based on “publicity paradigm”. Among them, the Party’s publicity needs and China’s realistic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have defined the “Xinhua style”. In addition, Mao Zedong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establishing the stylistic ideas and developing the stylistic skills of “Xinhua style”. The three factors, i. 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us of Xinhua News Agency as a national news agency, the formation of the “Press Release System”, and the need to publicize the socialist achievem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intl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us of “Xinhua styl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nnotation of “Xinhua style” has been continuous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history and media structure. In the new era, the reform direction for “Xinhua style” is to become a type of news writing which is informative, reader-friendly and of high-quality.

Keywords: news style; publicity paradigm; stylistic paradigm; Xinhua style

About the author: LIU Yong, PhD in Journalism,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